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郭齐勇　著

中 华 书 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20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学,而他所

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 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大陆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之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 年 2 月 4 日

序　言

中国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相关联：中国如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将明清三百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思想界出现的新思想看作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萌芽的学术观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观点之一。这一学术观点还涉及更大的学术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发展的还是停滞的，现代化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经验还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究竟如何发展自己的现代文明，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固然，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行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但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生活模式，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时代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活动之中，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保持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独特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多元的文化格局是否能达成一个低度的文化共识？如果全球化时代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缺乏基本的低度文化共识，我们的交往是否可能？如果有一个基本的低度文化共识，那么这种低度共识的文化理念究竟是什么？是基督教的博爱，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其他宗教、文化的理念？由现代西方文化最先发展出来的一套文明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究竟是普世的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值,还是特殊的价值?每一个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专业分工,个人兴趣的不同,并不一定都要直接思考这些问题。但任何人文学者的研究都应当有益于当代及后代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算苛刻的人文学的尺度。

我个人的学术起点是明清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自1989年追随萧萐父先生研究明清哲学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发掘明清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本书的甲、乙两部分文章,多是继博士论文之后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从时间单位来看,20世纪已经过去了。然而20世纪明清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与反思,从而进一步推进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晚期,是西方汉学家们的学术设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先生亦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封建社会的后半段时期。而胡适之先生干脆将自北宋至晚清的近千年历史看成中国的"近世",这与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等人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成是中国近代时期的观点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个人认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近代性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学术观点,但是要深化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必须要综合反思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与宋明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尤其不能简单将明清学术、思想看作是对宋明的"反动",而应当是,既要看到明清学术、思想对宋明学术、思想批判、创新的一面,又要看到明清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思想继承的一面,这样,将会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的事实。由此,我们既可以反驳西方近现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的各种论调,亦可以深入反思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致扼制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与思想因素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史的"支援意识"。

其实,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中国人,一方面眷恋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感叹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肤浅化与人的平面化的缺失。当代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儒教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复兴,正昭示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某种精神的需要。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三代新儒家们共同的精神努力方向。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现代新儒家们的集体思考成果已经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遗产。而透过新儒家的思考再次回溯到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将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思想过程。本书的第三部分的几篇文章正是近十年来我个人在这方面思考的部分成果。我个人认为,现代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承认个人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是从学术上最为全面地阐述了自由的价值及其适用范围的思想体系(尽管它没有穷尽"自由"的全部奥义)。而儒家思想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是其"仁学"思想,"仁学"思想中的核心理念是"把人当人看"。正因为儒家思想拥有这一核心理念,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才拥用了可以沟通的精神通道。而这也是儒家学说能够穿越漫长的历史隧道,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与西方哲学始于惊异、终于"求智"(或曰爱智)的精神风貌略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虽也不乏对形上之道的关怀,也有"神道设教"的宗教性维度,但其神韵还在于此世生活中理想人格的养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有思考,落实在实践哲学层面,最终都关系到人格的培养问题。然而,现代中国社会在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知识精英的人格理想,特别是儒家的大丈夫人格、君子人格曾经一度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西方社会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与宗教的神圣化相对立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倾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与精英人格理想相对立的"平民化人格"亦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倾向。当然,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精英人格理想也曾经以另一种歪曲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现代的"英雄人格"形象。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亦重复出现。从各种禁忌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如何确立自己人格的内在统一性,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是中国当代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的个人精神生活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契先生,将现代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结合起来,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思想,将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理论与现实

问题。本书的第四部分的论文，正是本人近十年来对此问题进行尝试性思考的结果，而如何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是近些年来本人从事所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自19世纪末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问题，因而所有的人文学术都不得不以此问题为核心目标，从各自的学科特点出发来回答这一问题。本书的所有文章都是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而给出的个人回应，至于其中是否有一得之见，期待学界同仁及其他关心时代问题的同道的评断，并恭请方家赐教。

目　录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研究方法论问题(代序) …… 1

新出楚简研究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 28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 …… 46
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与道德论 …… 55
再论“五行”与“圣智” …… 67
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 …… 79
上博楚简《恒先》的道法家形名思想 …… 91

儒释道精神重探

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 …… 104
论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 …… 118
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 133
《老子》《庄子》“道”论发微 …… 151
原始儒家的正义论——以《孟子》为中心 …… 174
礼学与现代生活及文明对话 …… 184
马祖禅的哲学意蕴 …… 193
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 …… 202
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及现代的意义 …… 221

现代学术发微

“五四”的反省与超越
——以现代性与传统为中心的检讨 …… 242
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合论 …… 257
论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 …… 271
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
——论冯友兰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 …… 286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合论 …… 300
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 328
冯契对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转进 …… 348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 367

附录　郭齐勇主要著述目录 …… 394
后记 …… 406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研究方法论问题（代序）

与西方哲学相比照，中国哲学有三个显著的特色：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接，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

一、中国哲学的创造转化

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这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标准、尺度，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民族有哲学。其实所谓一般、普遍的哲学或哲学只有一个，第一是说不分东方西方的哲学，所讲的概念或道理，或哲学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第二是对不同族群、不同时空的哲学形态中的共同问题或方法的抽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凡是人类各族群的活动，总有一些观念在指导，有些观念是互通的，而且有观念就有普遍性。这是其共性的或者具有可比性、可以通约的方面。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是有差异的，哲学观念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生命来表现的，因而又是特殊的。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在远古时期，各个大的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族、族群的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既相类似又不尽相同，人们思考或追问上述问题的方式亦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观念、问题、方法、进路，有不同的哲学类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中东、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

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康德区分两种哲学的概念，一种是宇宙性的，一种是学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学概念，把哲学当作关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的之关系的学问。这种定义把哲学视为人类为理性立法的学问，或视为人类探求终极价值的学问。这恰好符合儒学的“至善”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中说，“爱智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是指人对万物(一切存在者)合而为一的一种和谐一致的意识。张先生认为，这约略类似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至于黑格尔只把普遍性概念、理念，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问视为哲学，至于海德格尔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称为思想家，不叫哲学家，那只是一种看法。他们这种看法并不能概括从前苏格拉底到后黑格尔的所有的西方哲学，包括与概念知识系统并存的其它西方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界定与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不一定要盲从它。不是只有符合这种尺度的才叫做“哲学”，才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果如此，一部分西方哲学，特别是非西方的阿拉伯、非洲、印度、中国与东亚的许多哲学智慧都会被抹杀掉。

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优长。尽管因为近两百年强势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学科专业训练的关系，人们一谈起“哲学”，潜台词或背景即是西方哲学，话语

方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方式,但中国哲学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其光辉是掩不住的。百多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先驱们以“格义”的方式或相互诠释的方式,把他们各自所熟悉的某一种西方哲学,例如胡适以实用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用生命哲学,侯外庐、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尔哲学等作为参考系来治理中国哲学,亦取得一定的功效,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之不可免的途辙。我们尊重并珍视前辈们的努力,他们为“中国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前辈们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借用金岳霖 1930 年在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所说,大多是根据某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或成见写出来的。

当然,金先生仍主张有一种所谓的“普遍哲学”(或“普通哲学”)。他指出:“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①

金先生的上述看法,可取的地方在于,我们甄别哲学的与非哲学的史料,哲学与国学的区别,哲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的差异,是要讨论哲学问题,要有哲学的形式、内容、方法。但金先生上述看法是有极大的问题的,他预设的“普遍哲学”仍然只是以欧洲哲学为蓝本的,是

①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新 1 版。

西方哲学的抽象。他主张的“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仍然是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主要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抽象为一般、普遍的哲学问题，然后再去对照、处理、发现或建构中国的哲学史料。金先生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写出来的，这很有道理，但金先生本人要以他所谓的“普遍哲学”作为唯一尺度衡量、评估非西方的哲学，其实与胡适一样，只是根据于一类哲学的主张去要求不同类型的哲学。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只是以西方哲学为范型的“哲学一般”去整理、范围中国的哲学。其病与胡适一样，不过胡适是以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哲学（实用主义），金岳霖则是希望以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路数来规范、框架中国哲学。金先生以“物理学史”来类比“哲学史”，说“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尤其不当。我们学数学、学物理学不必去学数学史、物理学史，而学习哲学则必须学习哲学史。黑格尔所谓哲学史就是哲学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他指的仍然只是西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没有国别史或族群史，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则不然。文学、历史学、哲学史上的族群差异，文学、史学、哲学史上的大家们的创造之不可重复性，均与自然科学不一样。金先生当时所持的“进步”观，及其背景上的“唯科学主义”等，是时代的局限。当然，金先生很矛盾，他以“旧瓶新酒”的方式论“道”，他仍然想提扬中国文化区的中心思想——“道”，仍有了不起的贡献。

傅斯年 1928 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言，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事实上，再怎么“进步”，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亦无法“进步”到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的地步，这两大类学科在有些方面是不可通约的。

哲学学科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然有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之处。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诚如史华慈所说：“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

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①]印度佛学中的哲学体悟与哲学思想在中国经过了佛学家们"格义"、创造性误读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国哲人与佛学家不仅创造了佛学的新义理、宗派、方法,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而且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学、宋明儒学又传到东亚,影响了东亚与全世界。西方哲学的汉译已不等同于它的原貌,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中国化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与过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样,古今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各大家的思想慧识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并正在与中国哲学的诸流派相互摩荡。因此,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国哲学"作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内外不同族群的和同一族群不同的哲学思维的渗透与融会。而且,我认为,"中国哲学"的"自己写"与"写自己",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事实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它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实际上,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范畴,已不会说话,不能说、写、讲哲学。

当然,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辨同异""别共殊"的问题,业师萧萐父先生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要注意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注意普遍、特殊、个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如冯先生那样把中西之别的问题都化约为古今之异的问题,不能把古、今、中、西、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化约或夸大。有一些哲学问题在某些层面是普世性的,在某些

① 本杰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层面又具有特殊性。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绝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回应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这个族群的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所谓“传统”不是“过去”，不是死的。“传统”是活着的、流动的、变化着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传统”亦包含着看似陈旧、死亡，却仍有生命力，仍需我们发掘并进行创造性对话和转化的因素。“传统”仍然有稳定的成分，在知识精英或社会大众的心理、致思、行为、价值方式上仍有深深的积淀。一定种族、族群、族类的某些价值意识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中国哲学”等概念，包括“哲学”本身在内，都不能不打上西学东渐数百年来的烙印，不能不是百多年来的学人以西方古希腊、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视域观照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过去的哲学的诸种新的认知、抽绎或诠释的整合。毋宁说，是近四百年来，特别是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综合与积累。

“民族的”或“民族性”，一如“传统”一词一样，也有“时间”“空间”向度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概念十分复杂，“中华民族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或“哲学的中国性”问题，都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对地把三千年来不断地吸收、消化、积累了域内外不同民族、族群哲学智慧、精神形态之精华的华夏族群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元明理学的思想传统，视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从典章制度、文化建构上看，从历史上社会精英的精神取向、精神归属感及对社会下层草根的渗透力等方面看，儒、释、道和宋明理学仍不失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的内容，即包含着华夏族群特质的宇宙观念、信仰体系、社会理想、人生体验、生死态度、精神境界、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等。这里有区别于华夏以外的族群的精神形态的本质特性。这些因素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作为思想文化的土壤，在底层起着重大的作用。尽管我们今天的生存样态、思维方法、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与清代、近

代以前的人,甚至与我们的祖父母、父母亲等前辈人有许多区别,但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中的连续性、继承性、稳定性。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的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面对我们人类、族群的生存危机,我们更加领悟到"中国智慧"的魅力。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麻烦和困扰;我们不能不承认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城市化、单线进步观与发展观、"现代化"、"现代性"、"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像双刃剑一样给人类、各族群造成的多面的至少是两面的影响。人与终极的他者、自然的他者、社会的他者之间,人与天、地、人、物、我之间,地域、国家、种族、族群、宗教、语言、文明、价值系统、性别之间,处于冲突、紧张、割裂、肢解、异化的处境之中。

二、中国哲学特征之一:创化日新 生生不已

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实体主义和机械主义,而中国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非实体主义和机体主义。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不变的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或世界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如如不动的静止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此岸与彼岸,心与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身与心,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做两橛,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哲学的主流是自然生机主义的,肯定世界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没有凌驾在世界之上之外的造物主或上帝。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荀子曰:"阴阳大化,风雨博施。"(《荀子·天论》)这都是肯定变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宇宙是逝逝不已、无穷往复的历程。庄子云:"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变化是普遍的,是没有终极的。《礼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